

中西学术文丛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五代时期
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

王赓武 著 胡耀飞 尹 承 译



中西書局

 中西学术文丛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五代时期 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

王赓武 著 胡耀飞 尹 承 译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王赓武著;胡耀飞,
尹承译. —上海: 中西书局, 2014. 4
ISBN 978 - 7 - 5475 - 0643 - 1

I. ①五… II. ①王… ②胡… ③尹… III. ①权力结
构—研究—中国—五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1693号



本书据 Wang Gungwu (王赓武)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3) 译出。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

王赓武 著

胡耀飞 尹 承 译

责任编辑 李碧妍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8.625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475 - 0643 - 1/D · 022

定价 35.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

先严 王宓文(1903—1972)

先慈 丁 俨(1905—1993)

中 译 本 序

我很高兴看到胡耀飞等先生完成的这项工作，他们很好地翻译了我的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胡耀飞曾向我征询，我鼓励他使用 50 年前出版的 1963 年原版。那个版本更为细致，且包含更丰富的参考文献，我认为更适合以此面世。出版社问我能否另拟一篇译本序文？我想首先得赞扬胡耀飞等先生翻译工作的细心认真。其次，关于数年前我修订旧稿时的一些想法，已见于 2007 年版前言，它反映了我的一种期待，即希望有关于我所谓“五代世纪”（the Wudai Century）的更多研究，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转折性意义的时代。

王康武

2013 年 5 月 4 日

新加坡

2007 年版序

中国的统一为常态，而分裂时代则为畸态。这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家、统治者，并最终成为大多数中国民众对中国政治与历史的看法。随着 1949 年革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重新统一，他们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们所接续的是继承清王朝疆界的一个共和政体，也就是一个自立于世界万国的、以现代民族国家为理念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实体。那么如何在统摄中国如此之久的天下（All under Heaven）观之外，考量中共之获取重新统一？不管新的中国现在是什么名号，恢复统一常态这种文明理念的能力，仍是正统的锁钥。所不同的是，现在强调的是拥有固定边界的主权国家，而不在于文明之统一。这种新的理念据说为国际法所界定。根据国际法，一国的边界要为其他国家所认可。因而，这一理念并非可由民族精英任意修改，像今天台湾与大陆统一、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领土边疆之类的话题，遂成为其新的显著标志。

中国人被持续地提示以“中国终不可分”这一理念是何等坚实可靠，它现在则被重新明确，并作为精英们的行动理念而得到捍卫；且中国人也被提醒，中国叙事与这一理念的联系是如何之紧密。这种理念在过去如此成功地传布，主要的原因即在于它总是被引入现实，因而总是被视为业已实现。但统一绝非完美。只要有某些最小的条件得以满足，有政治实体宣布统

一被广泛认同，通常来说也就足够了。中国的统治精英接受了这种务实的态度，因此他们确信这一理念总是接近于中国的现实。这些精英甚至不曾是传统上所认为的中国人（今称之为汉族人）。大一统之后的第一个千年里，来自北面和西面的入侵者，从匈奴、鲜卑到突厥、回鹘和吐蕃，都曾试图进占中国腹地。到了第二个千年，契丹、女真、蒙古和女真人的后裔满洲，则更为成功。在这 1000 年里约有 700 年左右的时间，即便不是整个中国，大部分也为其所统治。以天子（Son of Heaven）所治“天下”为标志的地域之分裂与统一，所有这些入侵势力在其中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正如官方历史记载所显示的，那些掌控一时，且直承正统王朝的胜利者们，才能被算作是“天子”；他们统治时间的短长则可以不必考虑。本书所研究的中代史中，后汉（947—951）二帝总共在位三年又 307 天。即使他们当初曾使中国陷入分裂也没有关系，只要他们为最终的重新统一做出了无论何种形式的贡献，他们都可被接受为正统的“天子”。

我对中国史最初的兴趣是在近代。我曾为那些在 1911 年清朝灭亡后割据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所吸引。饶有兴味的是，当时中国的精英，无论武人、官僚还是知识分子，一致认为他们应当投身到中国的重新统一之中去。四十年间，他们努力投身于这项事业，并且很多人准备以自我牺牲来换取版图混一。^[1]他们的所书、所言无不提醒着中国人，乱离之世多在分裂之时；特别是 3 世纪汉代之后和 9 世纪唐朝以后的割据状态，后者则是“天下”最后一次以同样的方式分裂。于是我要问，何以那种特殊形式的统一在此之后会实现？这项研究完成于 1957 年，初名《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从而试图理解这个分裂时代所发生的、促使中央集权得以恢复常态的事件。它起始于唐朝（618—907）衰亡的最后阶段，讫于五十年后的

947 年，此时最终推动重新统一的基础开始明确，因此我并未继续探讨 960 年以后由宋初太祖和太宗完成的统一的最后措施。那些事件在宋代的记载中已被颂扬；许多晚期的历史已经由 Edmund H. Worthy 在其 1976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予以重新检讨和描述。^[2]

所有的中国史家都认为，唐朝皇帝的权威并未能长久持续。到了第五位皇帝玄宗（712—756）在位的末年，一系列的入侵和反叛导致京城长安陷落。虽然京城收复了，王朝却再难恢复元气。下个世纪里，中央权威持续衰弱，北方很多藩镇节度使坐享极大的自主权，从而滑入无政府状态，更多的叛乱亦不可避免。最终，唐朝于 907 年灭亡，代之以五代十国（907—960）。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天下”分裂局面。自此以后，9 至 10 世纪的历史处于并未持续太久的畸态语境中，直到重新统一，恢复常态。对于编纂这段历史的繁难工作，所有后来的史书都深受欧阳修（1007—1072）和司马光（1019—1086）著作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欧阳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统治的镜鉴）。^[3]它们都捍卫中国史主要是政治史的正统观，这种正统观的精髓总是蕴含在中国的统一之中。对于统治者和他们的士大夫，其神圣使命就是不惜一切地维持中国统一的理念永世长存。

自从 1911 年清朝和“天下”体系崩溃之后，一些受西学方法影响的中国知识人，已开始沉浸于社会史和经济史，并试图摆脱这一政治正统。其他人发现日本近代学术对此问题有助益。有一群人大规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共同重构中国历史，将两千多年统一与分裂的大部分时间描述为一个“封建”（feudal）时代，农民起义可以为这个时期里所有重大变化提供最好的解释。我进行五代史研究时，正值农民起义及封建论模式成为新的正统。我认为这个模式并不能够说服我套用到

我所研究的时代，因此我选择不接受它。相反，我集中于从文化和军事上重新检讨中国最为分裂的时代再统一的方式和手段。显然，这个时代的主角们很少有时间去考虑什么能够结束割据状态；为了生存而不顾一切地战斗耗尽了他们的精力。但提供统治架构的天下观总是提醒人们，需要有新的天子来担负更大的责任。将9世纪主要的分裂趋势予以终结，已经不仅是一种理念，而且是必须的，如果战争永不停止的话。10世纪的文、武系统正是以这个目标来重构的，尤其是在北中国。且在有游牧民族极大入侵之险的边镇地区获得相对成功，最终促使这些北方王朝能够重新统一以前唐朝在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疆土。向中央集权努力的前60年之旅程则构成了本书的主题。

在准备这第二版时，我曾斟酌是否吸收新进的研究来修订此书。^[4]有的新成果集中探讨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对经济的影响，以及一些显著的社会变化；也有一些研究揭示了唐代的精英群体，潜流般地延续于干戈扰攘之际，并以“天下”建设者的身份重新现身于宋代；其他的一些研究则强调了这个分裂年代的文学、艺术成就，以及科技和贸易上的创新。但与中国史上的其他伟大时代相比，五代时期仍未引起多少关注。大多数中国史家对于分裂的乱局都有一种天然的不耐烦。这与欧洲史家赞美差异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当欧洲史学作品聚焦于近五个世纪内众多形成中的民族国家之时，中国史家更倾向于认为，在“天下”一统的语境之内，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对于他们大多数人，亦即对于大多数中国的军事、政治统治者来说，解决分裂畸态的唯一正确出路就是尽快结束它，以开启更重要的事业。

我一直留意于本书问世四十年以来刊布的有关五代时期的专著和论文，^[5]对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史，并无新的史料。尽管有些努力重新检讨这一时期发生的结构和制度变迁，但并无论

著能够反驳本书的主要观点。所以我决定对最初研究的要旨一仍其旧，仅对其中一部分略事修订，以使其更具可读性。基于同样的理由，我还删掉了某些技术性的材料和一些在当时看起来必需的注释。

中国人所关注的统一正在变化，但这些变化令中国的处境在当代世界中是否更加安全，则尚不明朗。代表着中国人自己所界定之文明国度的统一“天下”是一回事，在近现代列强阴影下形成的统一民族国家则是另一回事。作为“天下”，对于那些不准备参与其中的周边民族是没有威胁的。这一点值得中国无论如何都要捍卫，因为它自视为一种仁慈和先进生活方式的代表。历史上，他们并不尊重轮番出现在其所处世界周边的游牧部落；在关于这些族群的史传中，基本不把他们描绘为温柔敦厚者。中国人与他们的邻居进行着贸易，也总是，甚至用心良苦地规劝他们接受中国的价值观。但中国人安于相信，中国核心部分要安全的唯一方式，就是中央集权式的统一；且他们的历史总是强调这个观念，使得所有那些想分裂如此一个中国的人都会回避。在那样一种语境中，本书中提及的大量无名或略有名气的官吏，都为统一贡献了点滴力量，皆可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迄今写就的中国史仍痛惜于五代的分裂，本项关于为重新统一做出准备的研究，则揭示了那些不得不生活于中国历史上分裂最严重的数十年之中的人们之行为。

王赓武

2005 年 12 月于新加坡

[注释]

- [1] Wang Gungwu (王赓武), “ Comment on C. Martin Wilbur, Warlordism in Modern China ”, in *China in Crisis*, Vol. 1, Book 1, ed. Ho

Ping-ti (何炳棣),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p. 264—270. 到了1960年代,我读了陶菊隐六卷本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之后,对军阀割据时代重拾先前的兴趣。我也曾受陈志让(Jerome Chen)关于军阀政治起源研究(*Yuan Shih-k'ai, 1859—1916: Brutus Assumes the Purpl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1)的影响。他的研究讲述了统一和中央权力的困局,导致数十年严重分裂的过程。这一困局也呼应了这里关于争夺10世纪对最高统治权的研究。稍后,我还有幸读了白鲁恂(Lucien W. Pye)的早期作品(仅有1971年版)*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71, 还有中国出版的一系列关于1916—1937年间历史的研究著作。后者包含了日本数度入侵中国领土的详情,这可与10世纪中国北方的契丹入侵相比。这坚定了我的信念,即五代时期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研究高度相关。

[2] Edmund Henry Worthy, Jr, "The founding of Sung China 950—1000: Integrative Changes i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h. 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6.

一项覆盖了重新统一前后各时代的近期研究是 Fang Cheng-hua (方震华),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S. D. 875—1063)", Ph. D. diss., Brown University, 2001. Ann Arbor, MI: UMI Microform 3006719, 2001.

[3] 欧阳修和宋祁等人修撰了作为官修正史的《新唐书》,而欧阳氏本人对于在此之后、宋代建立之前的那个时期的兴趣,使他重新撰述五代的历史。他认为官修的《旧五代史》是据南北各割据政权的历史记录草草修成的。他的著作,后来叫做《新五代史》,现已大部分被翻译为英文,并缀以导言一篇,即 Richard L. Davis (戴仁柱),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Five Dynas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其实对于这个长期纷乱扰攘的时代,没有比司马光《资治通鉴》更好的书了,其最好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56年版。

[4] 自从1957年拙著杀青以来,大陆与台湾出版了大量研究晚唐、宋初及其间数十载乱世的论著。但早先关于五代的专论并没有多少。写作前想看而未得见的一部书是韩国磐为柴荣(921—959)作的传记:《柴荣》。柴荣是后周(961—960)的第二代英主,954—959年在位,此书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的《柴荣》。如果当时看到该书,我会有勇气叙

述统一进程至 959 年，而非随后汉而尽于 951 年。此后，栗原益男刊布了其更全面研究柴荣的著作，《乱世の皇帝》（《乱世的皇帝》），东京：桃源社，1979 年。读了这两本之后，使我认识到，柴荣确于 950 年代后期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因为接下去的二十年里，一个新型的中央权力建立，最终吞并了负隅顽抗二十余年的小王国和藩镇。

[5] 关于这一时代最典型的总体史著是：陶懋炳：《五代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二者都在北京新华书店（译者按：实为三联书店）1961 年版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的基础上成书。这些书都贯彻了农民起义导致唐朝灭亡的理念。

最近一本关于唐五代中央权力组织的论著也聚焦于本书同样涉及的制度变迁，它是戴显群：《唐五代政治中枢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年。他所写的关于枢密院的专章（在其书中为枢密使），反映了这一主题的最新研究动向。不过它并未超过苏基朗 1977 年的论文《五代的枢密院》，收于氏著：《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 年；或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

原 版 序

中国和日本的学界先进，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为唐宋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他们的大量研究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贡献良多，对此我深怀感激。对于两个王朝之间的变革这个艰深的研究领域，我更为感激日本周藤吉之教授及其同事、学生们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当然，本书的结论是我自己的，其中如有错误，希望不要归咎于上述这些学者。

这项研究原本是作为申请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博士学位而提交的论文，1955—1957 年完成于伦敦和剑桥。在此期间，我同时受到了来自杜希德（D. C. Twitchett）和蒲立本（E. G. Pulleyblank）两位教授的热心帮助。对于他们在我新近致力探研中国史时所给予的个人关怀和极大耐心，我深怀谢意。在伦敦，我还受到了来自霍尔（D. G. E. Hall）教授的很多鼓励，他给了我由研究东南亚转到中国的勇气；可接触的材料也使得这一转变得以成功进行。另外，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中文图书馆的 E. Lust 先生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中文图书馆的 M. Scott 博士，他们的热情帮助使我的研究能够轻松愉快地进行。

还有很多人也使我受益，C. N. Parkinson 教授、E. T.

Stokes 和 Ian Macgregor 先生，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教我喜欢历史。我的同窗好友黄麟根博士则阅读了初稿，提出了有益的批评。这项研究得以顺利开展，也离不开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和伦敦中国协会（China Society in London）的慷慨帮助。对于他们的支持，我深表感激。

对于我妻子，我欠她的太多了。在我研究与写作的每一个阶段，她都给予了鼓励与帮助。这项成果在很多方面也同样属于她。

王赓武

1961 年于伦敦

晚唐至宋初统治者表

唐：

李儼（僖宗），874—888

李杰（昭宗），888—904

李祚（昭宣帝），904—907

梁：

朱温（太祖），907—912

朱友珪（郢王），912—913

朱友贞（末帝），913—923

后唐：

李存勖（庄宗），923—926

李嗣源（明宗），926—933

李从厚（闵帝），933—934

李从珂（潞王），934—937

晋：

石敬瑭（高祖），937—942

石重贵（出帝），942—946

过渡期：契丹—辽

2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

耶律德光（太宗），946—947

汉：

刘知远（高祖），947—948

刘承祐（隐帝），948—950

周：

郭威（太祖），951—954

柴荣（世宗），954—959

柴宗训（恭帝），959—960

宋：

赵匡胤（太祖），960—976

赵光义（太宗），976—998

目 录

晚唐至宋初统治者表	1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藩帅与唐廷（883—904）	6
第三章 中央权力的发展（883—907）	44
第四章 梁朝与唐室中兴（907—926）	82
第五章 对藩镇的控制（907—926）	112
第六章 朝廷的政治权力（926—946）	140
第七章 藩镇的衰落与新权力结构的出现（926—947）	167
附录 五代史上河东道与河北道的联盟	197
史料说明	206
主要参考文献	212
索引	218
译后记	240